

5571 4.41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防止“和平演变”与加强高级干部队伍建设

陆九云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1991年7月

论 文 提 要

高级干部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骨干，执政党要实行正确的领导，必须要建设一支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高级干部队伍。

高级干部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关键人物。他们要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本国实际出发，制定并切实执行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指明斗争的正确方向，这是取得革命建设事业胜利，从而取得防止“和平演变”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高级干部又是纠正党内机会主义错误、击退敌对势力进攻的中坚力量。在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攻势中，他们既是进行防止“和平演变”斗争的主要力量，又是敌对势力进攻的主要对象。西方“和平演变”的企图能否实现，从一定意义上说，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高级干部的状况。高级干部还是廉政建设的重点对象和反腐败斗争的主要力量。高层领导人己身正，才能制止下面的不正之风与不法行为。

加强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必须正确分析高级干部队伍的现状。既要看到高级干部队伍从总体上说是健康的、有坚强战斗力的，又要看到他们在政治觉悟、思想理论、工作作风方面的不足之处，认真加以解决。

进行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必须按照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标准提出严格要求。要向他们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推动他们加强党性锻炼；要促使他们坚持长期投身于实际斗争之中；要切实对他们实行监督；要坚持集体选拔、慎重选拔高级干部。

防止“和平演变”与加强高级干部队伍建设

70年代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加紧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战略，并且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得手。严峻的现实，要求执政的共产党把防止“和平演变”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其中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是要保证领导权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这就首先要建设好党的高级干部队伍。

(一)

高级干部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骨干，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防止“和平演变”斗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党是执政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而要实现党对国家政权、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正确领导，从组织上来说，必须要有一支真正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在省、市、自治区和中央部、委以上党政机关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高级干部队伍。从一定意义上说，高级干部是身系党和国家命运的一层人。

历史唯物主义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同时肯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特别是代表先进阶级的杰出人物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革命实践活动需要领导，他们中的主要领袖人物的指导作用发挥得愈充分，革命实践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也愈大。领导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政党，尤其需要一个“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①否则，无产阶级就不可能胜利地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即提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②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是我们党和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非常关键的时期。我们不但需要造就千百万各级各类干部，尤其需要造就一批被称之为群众领袖的高级干部。能不能建设好一支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忠心耿耿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的高级干部队伍，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防止“和平演变”斗争的成败。

——高级干部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关键人物。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统一，政治领导是首要问题。实现党的政治领导，首先要求组成党的领导核心的高级干部，能创立和发展科学理论，并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从本国实际出发，制定出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指明斗争的正确方向，这是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从而取得防止“和平演变”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时，几乎葬送了革命，搞垮了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革命实践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找到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并带领人民艰苦奋战，创建了新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又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只要努力使这些基本原则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具体落实和丰富发

展，我们就能战胜西方国家遏制和推翻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方面，高级干部担负着制定政策措施，决定重大事项等重要任务。为了保证决策和决策的执行符合人民的利益，他们必须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在决策时能把握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必须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国情、省情，对各方面意见进行比较、鉴别和论证；必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实行正确的集中。在决策作出之后，高级干部要带头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不能政出多门；在决策执行中，高级干部要及时了解情况，总结经验，补充完善，纠正偏差，努力发挥政策对实践的正确指导作用，防止出现大的失误。反之，如果领导集体和主要领导干部在指导思想出了偏差，决策和决策的执行发生严重失误，党的事业和群众利益就要受到损害。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层次越高，影响的范围越大。从1957年到1978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曾20年徘徊不前，中央已经深刻总结了教训，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进行了全面纠正。近十多年来，党中央制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在具体工作指导和某些具体政策措施上也有缺点和失误，这些缺点和失误的发生，是和中央个别领导人的错误分不开的。由于中央个别领导同志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造成可乘之机，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实践证明要坚持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领导，就必须有一支素质良好的高级干部队伍。

——高级干部是纠正党内机会主义错误、击退敌对势力进攻的中坚力量。我们党曾多次因为机会主义的错误和敌对势力的进攻而处于危急关头。正是党内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洞察全局的政治远见和一往无前的斗争勇气，在困难时刻坚韧不拔，依靠群众力挽狂澜，才使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毛泽东同志曾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1976年10月，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危急关头果断决策，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又一次挽救了中国共产党。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动乱，开始由于中央个别领导同志的错误，使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气焰极其嚣张，直至掀起反革命暴乱。在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面临存亡的紧急关头，又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顶住压力，准确定性，采取断然措施，稳住了局势，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历史性的灾难。当前，在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攻势中，党政高级干部既是进行防止“和平演变”斗争的主要力量，又是敌对势力的重点进攻对象。尼克松就公开宣称，要在共产党领导层中寻找“合作者”、“代理人”。这又一次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远见卓识。他在60年代中期就曾指出：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基本上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进行的：高级领导层出现机会主义思潮，并逐渐占据优势——党的领导核心蜕变——党蜕变——国家蜕变——社会制度蜕变。这说明西方“和平演变”的企图能否实现，从一定意义上说，决定于社会主义国家高级领导干部的状况。

——高级干部是廉政建设的重点对象和反腐败斗争的主要力量。进行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其中一项战略措施，就是坚持不懈地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现在人民最为不满的是少数干部存在官僚主义、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徇私枉法等问题。犯有此类错误与罪行的人不都是高级干部，但高级干部应该成为廉政建设的重点对象。这主要因为，高级干部的地位高，影响大。各级干部手中的权力，

都是人民授予他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如果哪一部分权力不是用于为人民服务，而是用以谋取私利，危害人民，就意味着那一部分权力变质，如果位居要津的人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则意味更大范围的权力变质，为数更多的群众利益受到损害，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高级干部权力大，面临的金钱、物质的诱惑也大，经受的考验更多。身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游泳，要得不呛水，不被水淹没，就要有更高的自觉性进行自我约束和接受外部的严格监督。高级干部还是反腐败斗争的主要力量。屋漏在下，止之于上。上层领导人己身正，就有力量教育、管束和制止下面的不正之风与不法行为。中国老百姓历来看重人格的力量。高级干部如果品德高尚，廉洁自律，本身就是反腐败斗争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国党内曾经涌现出象周恩来等同志那样大公无私，忠诚正直，自奉俭朴，心系人民的高级领导人，他们以自己的高风亮节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与震撼力，既能把亿万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又足以使一切丑恶灵魂无地自容。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说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任，直至完成无产阶级的崇高历史使命，就必须切实搞好自身建设，而加强高级干部的队伍建设，正是执政党建设的核心问题。

(二)

加强党的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必先研究高级干部队伍的现状。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曾指出：“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时间过去了36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毛泽东同志对党的干部队伍基本状况的估计还是与现在的情况基本相符的。特别是几千名高级干部，绝大多数忠诚于党的事业，能够自觉积极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与各项政策，并且经受住了1989年那场政治动乱的严峻考验，为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诚如江泽民同志在1989年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不可低估国际敌对势力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对我党造成的影响；不可低估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对党的建设的破坏。他讲的是全党的情况，高级干部队伍也同样受着这些影响。1989年的春夏之交，正由于党的高层领导机关中个别人出了问题，才使那场政治风波延续了50多天，并造成极恶劣的影响。高级干部中还有极少数人在政治上蜕化变质，或以权谋私，腐化堕落。1989年全国共查处党内违纪案件19.7万件，处分党员15.8万人，其中有省、部级干部16人。1990年，全国各级纪检机关共受理案件206,515件，共处分党员170,419人，其中省军级干部24人。今年三月，又有两名部长因违反纪律、以权谋私被免职；一名原中顾委委员被开除党籍。上述情况说明，尽管犯有各种错误的高级干部只是极少数，但是，加强高级干部思想作风建设，仍是不可忽视的大事。尤其应该看到，在党的高级干部队伍中，作为中流砥柱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已经为数不多。土地革命时期的、抗日战争时期的经过革命战火锻炼考验的干部，正在逐年减少。相当一批年富力强的中年干部进入高层领导。这些同志文化水平较高，勇于开拓，进取精神强，有许多长处和优点，也存在弱点和不足。例如，较少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教育。中央党校在1988年举行的一次高中级干部新学员测验中，及格的只占14%。①政治上

不够敏锐，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有时缺乏明辨是非、驾驭全局的能力。由于没有战争年代一旦脱离群众就无处立足的亲身体会，因而往往缺少必须密切联系群众的紧迫感。少数人对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不熟悉，公仆意识不强烈……等等。对这些同志如果不加紧进行培养教育，若干年后，就很难保证领导权继续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

毛泽东同志早在6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陈云等同志又多次强调培养中青年干部，甚至提出“老干部要把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作为第一位的、庄严的职责”。^④十几年来党在干部制度改革和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如：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做好新老干部合作交替工作，使大批中青年干部进入包括中央领导机构在内的各级领导班子；加强对干部的培训，等等。这方面成功的经验很多，也有不少教训。例如：在贯彻干部队伍“四化”方针方面，对革命化注意不够，理解得不全面，有时对干部的政治思想品质问题有所忽视；一段时间片面强调文凭，使有些班子结构不大合理；一段时间片面强调年轻化，使有些年轻干部提拔得太快，缺乏关键性岗位的实际锻炼。在干部培训方面，一段时间偏重学历教育，片面强调正规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抓得不紧，突出党性教育不够，等等。这些是我们今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高级干部队伍建设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三）

进行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必须按照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标准来对高级干部提出严格要求。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都曾强调指出，省、部这一级的高层领导干部，不仅应当是业务上的行家，而且首先应当是一个有胆有识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是列宁所说的那种“职业革命家”。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一个以革命为职业的党的高级领导骨干，在现阶段，首先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有坚定的原则性，敢于和善于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行为作斗争。在任何艰难曲折的形势下，都能洞察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带领群众坚定地沿着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其次，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鞠躬尽瘁，无私奉献，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始终与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第三，要有卓越的领导才能，有主动性和预见性，善于正确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第四，要有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能严格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有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风，能团结同志，特别是能团结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按照这样严格的要求建设高级干部队伍，就要着重做好这样几项工作。

向高级干部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教育，帮助他们掌握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扎实的理论功底，这是一个人确立科学世界观与无产阶级政治立场的基础。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之不多的人，何谈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呢？高级干部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界限。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提高政治上的观察和分辨能力。特别在风云变幻、局势扑朔迷离的情况下，要善于透过复杂现象，把握事物本质，判明政治倾向，预测发展趋势，从而作出符合实际的对策。在1989年的动乱中，高级干部队伍从总体上说是经受住了考验。但诚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所说，并不是多数人一开始就能自己动脑筋清醒地判明事情的性质。有些领导干部是凭经验、凭组织纪律性稳住阵

脚的。这作为基层干部尚可理解，作为高级领导干部，则很不够，也是危险的。其次，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用来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实践，从理论高度把握党的基本路线的精神实质，才能在制订和贯彻各项方针、政策、措施、方案时，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既严格掌握政策界限，又认真注意政策导向。既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又利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再次，高级干部学习理论，要善于运用基本理论原则，总结改革开放实践中的新经验，研究新问题，寻找新结论，开拓新领域，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许多中央党校和省委党校的高中级干部学员，在学习过程中，联系自己的思想工作实际，写出了有理论深度，有独立见解，对当前实践有指导意义的好文章，这是可喜的现象，也是我们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正确方法。

要推动高级干部进行党性的修养和锻炼，自觉改造世界观。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并不一定就是道德上的“完人”。列宁说过，“工人领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不是英雄，而是普通的人。”^⑤既是“普通的人”，自然也会在思想上受到社会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认识事物的能力上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这就很需要提高党性锻炼的自觉性。特别是中青年领导干部，对党的优良传统不熟悉，缺少艰苦斗争的锻炼和生死考验，又面临执政、改革开放和防止“和平演变”的现实考验，更要自觉增强党性的修养和锻炼。

高级干部的党性锻炼，当前要着重解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这同上述的政治立场、政治信念是紧密联系的。身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高级干部，要牢固树立权力是人民授予的观点，自觉使自己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还要很好掂量自己手中权力的份量。权力越大，所发挥的正负作用也越大。一言九鼎的人，正确决策、正确指挥，可造福社会、造福人民，荫及后代；反之，也能造成难以挽救的巨大损失。如用以谋私，则足以使一个人或一群人万劫不复。处于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历史条件下，高级干部更要加强道德情操的修养，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做到以俭养廉。周恩来同志当年曾要求领导干部过好“五关”，即除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外，还要过好生活关和亲属关。由于战争年代供给制的残余影响，还因为我国现在实行低工资制，所以还保留着对高级干部工资以外的一些待遇，如住房、用车、配备公勤人员……等等。这些属于制度规定，享之合法，却未必尽合理。我们一些功绩卓著的老一辈革命家，一生严于律己，从不允许自己在生活上比群众特殊。1959年周恩来同志到广东从化温泉休养，想到温泉地区的老百姓还不容易用上温泉水洗澡，便向有关负责同志提出，建议向到温泉休养的同志募捐，给温泉人民建一座浴室。他和邓颖超同志每人先捐了100元。前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沈鸿，当过部长，却拒绝住进部长楼，理由是“部长不一定非要住部长楼”；可以领取保姆费，却一直拒领，认为“个人开支理应由自己付”。这种严格克己的精神，是人民公仆应该具有的可贵精神，却不是多数人所能做到的。处理这个问题要区别对待，对于那些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的老同志，应该给予必要的照顾。对于新步入高层领导班子的中青年干部，则不妨从紧掌握。前几年曾有过“新人新办法”的说法，希望能通过党政机关工资制度改革的深入而付诸实施。这对于培养领导干部的公仆意识，对于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将大有裨益。高级干部还必须认真过好“亲属关”，认真对待周恩来同志当年提出的对亲属和子女，“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的问题。周总理当年语重心长地指出：“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遗憾的是，尽管高干子弟中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确实出了一批“少爷”。少数高级干部对子女约束不严，甚至纵容他们为非作歹，引起了人民的公愤。近几年揭露的政治

上蜕化变质的高级干部，同时犯有纵容家属子女从事非法活动的严重错误。这更说明周恩来同志提出的五个“关”，本身就是相互联系的。高级干部的党性锻炼，还要培养履行领导职责所应具有的心理素质与品格。有些缺点，存在于普通党员或基层干部身上影响有限，存在于高级干部身上则往往铸成大错。列宁晚年曾评价斯大林说：“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①因为种种原因，列宁的建议未能实现，后来历史的发展，不幸证实了列宁的预言。高级干部要自觉克服这些不适应领导和指挥的心理素质与性格缺陷，才能更好地团结和吸引优秀人才一道工作。

要促使高级干部坚持长期投身于实际斗争的锻炼。历史证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切优良品质，都是在各个时期最艰苦复杂的环境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我们党的第一代、第二代的领导核心成员，经受过严酷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锻炼；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经受了改革开放实践和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生死搏斗的考验。按照列宁的说法，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应该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们。而威信、影响和经验都来自于实践，是在实际斗争中产生的，不是靠宣传可以树起来的。现阶段虽然极少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但有新的实践考验。例如，政治斗争的考验。新时期的政治斗争，不仅有敌对势力公开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还时常有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其中。身为高级领导干部，就要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处置复杂的问题，区别不同性质的矛盾，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稳住全局。又如，党内政治生活实践的考验，一个高级领导人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能否坚持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光明磊落，公道正派，既能坚持原则开展斗争，又善于团结有各种不同意见的同志一起工作，发挥领导班子的整体优势。这些都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政治品质和政治行为能力。再如，社会主义现代化两个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的考验，从这些日常工作中，可以锻炼和考察一个干部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统率全局的能力，决策能力与组织指挥能力，看出一个干部的政治成熟的程度。所以，越是高层党政领导，越应该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锻炼与考验。

要加强对高级干部的监督，健全和完善行政监督、法律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党内监督、群众监督等各种监督制度。掌握最高决策权的领导干部，应该是监督的主要对象。监督的主要任务，不是对已犯了错误的人进行查处，而是对未犯错误的人防患于未然。因此，做好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一方面要使领导行为法制化、规范化，有了明确的行政责任制度、具体规范要求 and 行为模式，监督者和被监督者才可以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纪可守，有关部门才便于监督和制约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使；另一方面要使监督过程规范化，从总体上对监督的性质与任务、形式与内容、主管机关、监督保障等基本问题作出统一的权威性规定，以保证党内监督工作制度化和高效率运行。从当前实际出发，对高级干部应加强党内民主生活的监督。党的70年历史证明，我们党内最高领导层中出了问题，都是党的最高领导集体自己解决的，这也是我们党有坚强自净力的重要表现。领导集体通过党内民主生活对领导班子成员实行监督，既能了解情况切中要害，又具有较大的权威性。因此，努力促使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化，并提高其质量，切实开展领导班子内部的自我批评与相互批评，是加强党内监督的有效途径。

要集体选拔、慎重选拔高级干部。选拔高层领导班子的成员，一定要由党的领导集体研究，同时依靠政治坚定，富有斗争经验的老同志。邓小平同志说过：“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①历史证明，由个人或少数人指定接班人，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成功的先例。选拔高级干部，要坚持对选拔对象进行全面、长期的考察。所谓全面，就是在坚持政治标准的前提下，对选拔对象的思想品德、领导能力、协调能力、科学文化水平、工作作风、工作实绩等各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在看实绩的同时要看思想，因为人们的一种行为往往可能受多种动机支配，不能让搞短期行为的人与投机分子混进高层领导班子中来。在看经历的同时要看素质，因为学历、经历并不能完全说明人的品质与才能。所谓长期，就是要经过相当时间的锻炼考验。“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任何时候都不宜搞突击提拔。除特殊情况，高级干部走一走“台阶”是必要的。而且最好在下一级岗位锻炼得比较成熟再上来，这比上来了再放下去挂职锻炼更有利。选拔高级干部要考虑年龄，但最好不要用“年轻化”的提法，而改用“年富力强”为好。我国宪法明文规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45周岁的公民才可以被选为国家主席、副主席。年纪过轻的同志，同样也难以适应省、部以上的高级领导职务。此外，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不仅要实行干部离退休制度，还应包括淘汰制。特别对身负重任的高级干部，一旦发现思想政治倾向不健康或力不胜任，就应及时调离重要领导岗位，不必非等到出了大漏子再撤下来。

我们党是一个久经考验、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党；是一个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而走向胜利、走向成熟的党。党有力量战胜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的挑战而始终坚强不屈；也有力量清除自身污垢而永葆革命青春。只要我们紧紧地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并建设好一支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领导骨干队伍，那就什么敌人也不能把我们压倒，什么手段也不能使我们“和平演变”。我们将永远高举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一直走向共产主义。

注 释

- 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197页。
- ②《毛泽东选集》（1951年版）第1卷第275—276页。
- ③《理论动态》817期第2页。
- ④《邓小平论党的建设》第168页。
- ⑤《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版）第18卷第160页。
- 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版）第36卷第618页。
- ⑦《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05—306页。